

人文國際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 创刊号 -----

主 编 周 宁
执行主编 盛 嘉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人文国际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 创刊号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2010年01月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国际/周宁,盛嘉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15-3444-1

I. 人… II. ①周… ②盛… III. 人文科学-丛刊 IV.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803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插页:1

字数:435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发刊词

《人文国际》(*Humanities International*)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的国际人文学术丛刊。本刊的宗旨是推动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人文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发展。本刊将刊登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领域中的专家和学者视野广阔、观念新颖的各类学术文章。本刊试图实现两种跨越与交流:一是跨越国家地理的疆界,通过搭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二是跨越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了解、互动与渗透。同时,本刊也将努力寻求地方性文化与学术全球化之间的平衡,推动中国学术的国际化 and 多元化。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10年1月

目 录

发刊词

专 论

1	周 宁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重新认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
21	张 光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金融革命
38	李元瑾 (新加坡)	华侨与华人:陈嘉庚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
50	林丹娅	性政治隐文:“私奔”模式与女性解放叙事
63	周建漳	真理成立的逻辑前提及其他
71	贺昌盛	1950 年代台湾文学的生存境遇
81	李智君	花儿流变中的多元融会及其地域格局
100	Hao Huang (美国)	American Jazz Poetry and Music: From Langston Hughes' Urban Blues to Michael S. Harper's Praise Songs
122	Song Ping	Transnationals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
135	Sheng Jia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y
146	Catherine Marquez Marin (哥伦比亚)	China in Latin America: Perceptions, Relations and Perspectives—How is Colombia Coping with the New World Context?

人文讲坛

165	Donald S. Sutton (美国)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Case
180	Swaran Singh (印度)	Rising Chindia: It's Critical to Stay on Course
190	Ariel Armony (美国)	社会创新方兴未艾:新理念如何改变世界

197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国际讲坛”一年回顾

述 评

201 鲁西奇 静谧的乡村:乡村秩序的法则及其基础

209 夏光武 厦门大学国际硕士全英语教学的创新与问题研究
——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例

历史语言学

215 Lau Chun Fa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Hong Kong Hakka Dialect

读史札记

223 谢 泳 读史札记

书 评

234 刘永华 赦罪书的诗学与政治: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

241 Tom Marling (英国) Broaden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Anarchism

251 饶佳荣 自传的阅读之道 ——伍梅芳《现代性的体验》介评

《人文国际》诚挚征稿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重新认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

周 宁*

【摘要】 西方的东方知识体系是一个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庞大系统,它甚至使非西方世界无法表述自己,而只能被西方表述。在西方对东方的知识与想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也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批判的、建立在二元对立观念秩序之上的东方主义;另一种则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它与西方现代理性的怀疑精神、危机意识密切相关。这两种相互矛盾而又相辅相成的东方主义,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的特有的活力,并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全面的东方态度甚至世界观。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成为一时显学的当下,我们应该放下褊狭与保守,以一种真正理性的态度,对待两种东方主义及其在西方文化整体结构中的意义。

【关键词】 东方主义;二元对立;后殖民主义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400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①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19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

* 周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① [美]麦尼尔:《竞逐富强》,倪大昕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地进行的。从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使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诚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也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

二

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英国著名散文家德·昆西在《康德论民族性格:论及崇高感与美感》一文中,将世界分为“地球的我们这部分”(our quarter of the

globe,指欧洲)与“其他部分”(the other quarters of the world,指世界上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①，“其他部分”主要指东方国家以及非洲、美洲的野蛮部落。在谈到东方国家与民族时，他说：

阿拉伯人是最高贵的东方人，但在性情趣味上，仍有野蛮的、不自然的浪漫倾向。阿拉伯人热情友善，宽容大量，言而有信；他们的小说、历史与整个情感世界充满传奇色彩。他们热烈的想象创造出各种怪诞扭曲的形象；连他们的宗教教义写得都像罗曼史。如果说阿拉伯人就像是亚洲的西班牙人，波斯人就像亚洲的法国人。他们是优秀的诗人，彬彬有礼，趣味高雅。他们并不是严格的伊斯兰教徒；即使对《古兰经》的解释，也显得开放热情。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东方世界的英国人，当然仅就他们的坚定，勇敢与不怕死的性格而言，而且他们的坚定常常流于固执。在其他方面他们很少表现出英国人的精神个性。印度诸民族沉溺于各种愚蠢的念头，几乎到了野蛮的地步。他们的宗教蠢话连篇，各种偶像荒唐怪诞，什么法力无边的神猴哈奴曼，不近人情的瑜伽苦修，诸如此类等等。还有寡妇自焚殉夫，都是他们野蛮的恶俗的表现。中国人就更荒谬绝伦了！他们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例如，当今北京，每逢日食月食，人们还跑到街上敲锣，据说要吓走吞食日神或月神的恶龙。这种远古时代极端愚昧状况下发生的陋俗，在中国都延续至今，而且不肯改悔，拒绝一切新知。^②

德·昆西将世界分为“我们”与“其他”对立对比的两个部分，而且，不仅这两个部分之间表现出高下优劣的等级关系，在“其他部分”中，也表现出等级秩序。阿拉伯、波斯、日本似乎成为西班牙、法国、英国的简陋的、拙劣的倒影，印度、中国则完全是堕落的“另类”，甚至比非洲、美洲那些原始部落更可憎。因为原始部落停留在自然状态，在他们那里，野蛮的意义在于文明等于自然，而印度与中国，既脱离了自然状态，又使文明陷入了病态的怪诞，是文明的畸形。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中，东方不同民族国家，在整体特征的共同性外，或共同的本质外，又有特征上的侧重点程度上的轻重之不同。伊斯兰世界与印度、中国就不同，伊斯兰世界中的土耳其与埃及、阿拉伯与波斯又不同，印度、中国、日本也各有特色，例如印度人、中国人狡猾软弱，阿富汗人、阿拉伯人却直率勇敢，再则，东方世界从土耳其到中国，也可能在地理上离西方越远，在西方心理想象中，邪恶的程度就越大。总之，西方文化不仅要塑造一个整体的东方主义，还要确立在这个东方主义体系中，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何种侧面上表现了那个共同的东方性。

世界是一张地图，绘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就被分为东与西、西方与非西方两个对立的部分。这张地图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绘制，到19世纪，世界在地理上已经被西方人“发现”完了，在文化上的“发现”也接近尾声。东方以至整个非西方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映在历

^① “Kant on National Character in Relation to the Sense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in *The Camelot Series: De Quincey's Confessions, & C.*, ed. Ernest Rhys, London: Walter Scott, 24 Warwick Lane, 1888, pp. 236 ~ 253. “地球的我们这部分”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的说法见该书 p. 237 与 p. 247.

^② *The Camelot Series: De Quincey's Confessions, & C.*, pp. 247 ~ 248.

史天幕上的渺小卑微的影子,似乎都在映衬西方文明与西方人的高大。东方作为整体,在西方文化想象中具有某种“东方性”,如神秘、放荡、残暴、堕落、专制、腐败、古旧、停滞、混乱、邪恶等反面特征和富有、强大、智慧等正面特征。这些特征是在西方历史不同阶段的东方叙述中积淀下来的,成为一种“保留特征”(repertoire),又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组合成所谓的东方本质。如古希腊时代西方想象的东方特征主要是神秘、放荡、奢华、堕落、专制、残暴,中世纪在上述特征中又加上了邪恶与魔鬼,反基督的色彩,从地理大发现到启蒙运动,东方一度具有了可疑的正面形象,到19世纪,西方的东方想象又转向反面,在传统的否定性特征基础上,又加上了停滞、古旧、腐朽、混乱、衰亡、非理性的特征。

三

西方的世界知识,是在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内构筑的。东方是一个广阔的异域世界背景,这个背景从近东或东欧开始。就像西方小于欧洲,东方大于亚洲,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东方世界从奥斯曼的欧洲土地上开始。埃及地处非洲,但在西方想象中的文化地图上,埃及也属于东方。但土耳其与埃及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地图上,都属于界限模糊的地域,令人困惑、厌恶甚至恼怒。

埃及与土耳其,或早或晚,3000年前或3000年后,都曾是强大的帝国,如今都已消失或衰落了。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像罗马皇帝那样想象埃及的神秘与富丽,但实际中的埃及除了陷在沉沙中的金字塔、夕阳中萨拉丁时代的城堡与破败的城市中的清真寺外,没有什么令人想起神秘与富丽的。麦哈麦德·阿里执政期间,埃及开始了西化的改革,1850年前后,英国游行家R. F. 伯顿到埃及,发现这些法老的奴隶的子孙们,也开始坐在椅子上,用刀叉吃饭,谈论欧洲政治,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法老的国家变得文明了,但这种文明令人讨厌……”^①欧洲人希望东方就应该像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一样,埃及就是金字塔与法老,土耳其就是苏丹与苏丹的后宫、浴室,波斯就是宫廷阴谋与舞女,印度就是吃树叶的苦行僧、崇拜怪神的扯谎者,中国则应该是抽鸦片、留辫子、缠小脚的国家。如果现实中的东方与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或者竟然有些类似西方,他们就会感到失望甚至恼怒,尤其是英国人,他们看到法国人热衷于帮助埃及改革很不习惯,一位英国海军候补兵抱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和这些肥裤裆、红帽子的黑鬼、埃及人,还有什么区别。”^②

在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埃及与土耳其在地理与文化心理中,都处于某种过渡地带,具有令西方人难堪的模糊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是强大的东方的代表,它不仅使东罗马帝国灭亡,将领土扩展到东欧,甚至威胁到奥地利。如今噩梦结束了,土耳其帝国已变成一个气喘吁吁的拖着肥胖身躯的老人,既不值得敬慕,也不值得恐惧,甚至有些滑稽可笑,或者令人厌恶。诗人拜伦穿上土耳其服装画像,觉得很有趣,音乐家们将歌剧的背景

① 转引自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London: Ebenezer Baylis and Son, Ltd. The Trinity Press, 1969, p. 119.

②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London: Ebenezer Baylis and Son, Ltd. The Trinity Press, 1969, pp. 117 ~ 118.

放到土耳其宫殿,英国旅游公司开始组织旅行团去土耳其旅游,1844年小说家萨克雷到地中海地区游行,他觉得很失望。这里并不是人们期望的那个东方,他发现土耳其苏丹看上去竟像是一个法国青年,而土耳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衰败的景象。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也不能重合”,然而,在土耳其与埃及,东西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似乎有重合的可能,这一点令人困惑、讨厌,也令人担忧。

西方传统想象中的东方中心在波斯与阿拉伯,那是“典型的东方”。古希腊的东方实际上就指波斯帝国,中世纪的东方基本上等于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到地理大发现以后,东方才扩展到中国与印度。波斯是西方的东方想象的核心,在地理与文化意义上,都具有核心的意义。从大流士时代起,波斯就是想象中放荡、纵欲、醇酒似水、美女如云的地方,也是残暴、危险、混乱、变幻莫测、人命微贱的地方,西方所有“一千零一夜式”的想象,场景都可以移到波斯。而且,在19世纪的现实背景下,波斯又具有了衰败、腐朽、死亡的征象。1824年,曾经出使波斯的英国人詹姆士·莫利阿出版了《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这部描写波斯宫廷生活的小说,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波斯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波斯的英军统帅敦斯特维尔还说,他的波斯印象,都来自《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小说中的波斯城市乡村破败荒芜,社会动荡不安,宫廷生活充满阴谋、仇杀、诱惑、危险。旅行者一个世纪里在波斯的见闻,也不外乎此。

或许法国人生性比英国人浪漫,英国旅行者报道的多是一个黑暗、混乱、残暴、淫荡的波斯,而法国人则发现了另一面。彼埃尔·洛蒂曾随八国联军到过北京,住过紫禁城慈禧的寝宫。在《北京的最后日子》中哀叹随着西方军队进入紫禁城,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也失去了美感。他曾带着同样的东方主义想象到波斯,在伊斯法罕,他贿赂一位波斯商人,帮他搬梯子爬上一家花园的墙头,偷看园内摘花的波斯妇女。他说掩在面纱下的波斯妇女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而波斯男子也像古希腊雕塑中那样英俊。他喜欢那个西方想象中古老、神秘而美的波斯,他喜欢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上徘徊,喜欢波斯的旧城,阒无一人的街头,道路两旁的高墙上没有窗户。当然,有这种东方趣味的西方人不仅洛蒂一位,也不仅限于法国人。早洛蒂几年到波斯的英国学者E. G. 布朗,一边诅咒波斯的腐败、混乱与残暴,一边也倾倒在波斯上流社会优雅的宴会与歌舞,甚至回到英国后还久久不能忘怀。他在《波斯一年》中表示,波斯最糟糕的城市就是德黑兰,因为这座城市西化得很厉害,不伦不类。在西方的东方形象中,东方应该就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东方。任何变化都令人不快,尤其是变得像西方,就更不可救药。在西方的东方想象中,东方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界,保持东方的“特色”,是一种堕落;学习西方,是另一种堕落。

西方人想象的伊斯兰东方,永远离不开一千零一夜的背景。在英国人伯顿的潜意识中,翻译《天方夜谭》与化装潜入麦加的旅行是同样的浪漫冒险。东方是神秘的、浪漫的、放荡的、邪恶的、纵情享乐又危机四伏,恰好为浪漫主义的幻想提供了素材。哈里发每天晚上娶一个妻子,第二天早晨杀掉,成为西方想象中关于波斯形象的最有代表性的象征。其中既表现了所谓东方式的纵欲与色情,又表现出东方式的残暴与虐待。而这两方面的想象又是西方的东方想象中最普遍最深层的主题。拉纳·卡巴尼在《欧洲的东方神话》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① 波斯是东方想象的核心,阿拉伯则是伊斯兰世界最神秘的地方。那个处于无

^① Rana Kabbani, *Europe Myth of Orient: Devise and Rul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 chapters 1, 2, 3.

政府状态的沙漠半岛,在西方的传说中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这个传奇是关于坚强勇敢、豪迈放荡的贝都因骑士与锁在深闺的多情的阿拉伯妇女的传奇。如果说 19 世纪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尚有一些敬慕之意,那全在关于阿拉伯的形象中。有趣的是,西方人一方面要将帝国主义秩序建立在被驯服的东方基础上,一方面又佩服东方人少有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们认为,在东方,中国人最软弱,阿拉伯人最强悍。

四

西方在历史上的千年冲突中形成的对伊斯兰东方的文化情结是复杂矛盾的,既羡慕、好奇,又鄙视、恐惧。19 世纪西方终于赢得了绝对的优势,衰败的伊斯兰世界在西方人看来,既不能逃脱灭亡的宿命也没有被拯救复兴的希望。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人的观念中,整个东方都处于一个愚昧、野蛮的黑暗状态中,但有的地区民族可以被拯救,有的地区民族则不可以被拯救。西方是拯救者,他们为东方带来文明与基督教,使他们摆脱固有的停滞与腐败。伊斯兰世界由于其强烈的伊斯兰教信仰,不可能接受基督教,因此在西方人看来也就失去了被拯救的希望。从伊斯兰世界进入印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尽管印度人宗教信仰浓厚,印度人见面谈论神就像英国人见面谈论天气一样普遍,但是,印度人信仰多样,他们可能信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为什么就不能信仰基督教? 他们能信仰一堆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神,为什么就不能信仰一个神,信仰《圣经》中说的那个上帝? 尤其是当英国人完全控制了印度次大陆,用一个只有 200 年历史的公司(东印度公司)统治一个有 4000 年历史的国家的时候。

在 19 世纪的英国人眼里,印度是不屑一顾的。我们可以从伯顿《走向圣城》中对印度人不经意的评论中看出。英国征服印度,就像两个世纪前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几乎是一个奇迹。一个庞大的帝国瞬间就毁在一个遥远的小国的一些冒险家手里,一个公司像经营贸易那样经营一个国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事业越是成功,就越轻蔑这些被驯服的东方人。印度人似乎永远是神志不清、软弱无能的。他们迷信各种奇形怪状的偶像,把自己的生活、国家搞得混乱不堪。他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不同种族等级,像是一层层封闭的抽屉。他们是些懦弱的人,英国人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南印度人更顺从的民族了;他们顺从是因为懦弱,同时又以狡猾、虚伪掩护自己的懦弱。一位英国军官说,加尔各答一个地方的骗子就比整个欧洲加起来还多。他们是些温顺无能的人,但有时却非常自私、残暴。寡妇自焚殉夫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但在印度却被当作美德。在殖民者眼里,印度既无政治,又无道德,印度是一个愚昧邪恶的国家,甚至就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低贱的、无能的、愚昧的、迷信的、邪恶的、残暴的族群。如果说西方人认为伊斯兰世界邪恶、残暴、淫荡,但还有些美、神秘、浪漫和勇敢,那么印度则一无是处。19 世纪西方人,尤其是印度的殖民者英国人想象的印度,是世界上最黑暗最令人绝望的地方,只有西方人入侵,才能带来光明与希望。

站在文明的炫目的光束中的欧洲人,只看到其他地方的黑暗,从来看不见自身的阴影。柯尔南在《人类的君主》中谈到 19 世纪英国对印度的看法时说:英国人“只想他们的臣民(印度人——引者注)如何坏,却从不将自己往坏处想。即使多少年后,英国人有些良心发现,也还是不放弃那些固定的看法:印度人道德败坏,毫无办法,气候、社会习惯、长期的东方

暴政,造就了这种状况,除非在外国力量的监护下,才能够得到改造”。^① 在道德、制度、智力、体力上贬低东方人,是西方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策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意识与制度上建立差异与优越机制。印度本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英国统治在印度原有的种姓等级之上,又建立了种族等级。英国人生活在印度,极力避免与印度人交往,通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年前往印度服务的英国人,都是牛津、剑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努力在印度人面前为自己塑造出半神化的形象,他们是全能的拯救者,印度只能服从、感恩。如果没有这种心理优越,英国人依靠几千人维持对印度的统治,根本就不可能。西方殖民者总是把自己塑造成半神或超人,把当地人贬为不文明的野兽、邪恶的魔鬼或幼稚的无法自理的孩子。在英国人看来,印度人从来管不好自己与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中他们不断被异族异教征服,莫卧儿帝国衰败时,印度再次面临着阿富汗与波斯人的入侵,多亏英国为他们带来了文明的秩序。英国人自己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入侵者。

西方想象的印度漆黑一片。正如罗纳德·英顿所说,“没有印度文化这一漆黑的岩石作底座,就显不出欧洲理性的光辉与明亮”。^② 在英国人眼里,印度人是低贱的,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低贱。19世纪英国文献中很难找到对印度的正面描写。印度人崇拜的那些奇形怪状、莫名其妙的神,令西方人恼怒,传教士对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去改变印度人的道德与身体。这种努力同样令他们失望,英国人反复渲染的印度人的形象是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而且肮脏,“他们从来不知道用肥皂与水”。

印度是东方最黑暗的地方,从印度往东北到中华帝国,那里即使不比印度更黑暗,至少也不差于印度;日本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谜,因为它一度比中国更封闭。19世纪中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只有恐怖没有神秘的地方,日本则是一个只有神秘没有恐怖的地方。1853年日本半推半就地开放,进入日本的西方人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精致到某种变态程度的文明。在西方人的印象中,日本人的礼貌与艺伎成为日本文化的象征。直到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西方人还将日本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玩具国家,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西方还在传说日本人因为眼睛长得太小,天生就不能当飞行员。从印度往东南到东南亚、南太平洋,西方人的世界视野才多了几分亮色。英国人到马来亚、法国人到支那半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们感觉这里是一个半开化但也浪漫的地方,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没有强烈的民族与宗教意识,连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回教社会也较为松散。在这个文化传统相对稀薄的地区,西方人感到更加自在自信,因此赋予这个地区的形象也就相应光明一些。当然,最光明处可能还要向南太平洋推移。1767年英船海豚号发现塔西提岛后,那里的阳光、沙滩、海风,热情好客的习俗,自由浪漫的性关系,都使西方人将塔西提当作人间乐园,塔西提人成为西方文化中一直传说的“高贵的野蛮人”。

五

在西方的东方视野内,伊斯兰世界是第一个东方,印度与中国是第二个东方,东南亚到

①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London: Ebenezer Baylis and Son, Ltd. The Trinity Press, 1969, p. 35.

② Ronald Inden, *Imaging India*, Oxford: Blackwell, 1990, p. 32.

日本是第三个东方。第一个东方表现出来的东方性,是西方人久已熟悉的,这种东方性对西方的威胁,持续了近一千年,从伊斯兰教兴起到奥斯曼帝国衰落。到18世纪中叶,这种威胁已经荡然无存,随之伊斯兰世界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也变得遥远了,多少失去了其现实性,变成浪漫想象的地方,第二个东方变得迫切与现实了。中国曾经是遥远的孔教乌托邦,印度是神魔之地,现在变成了出产茶叶、消费鸦片的国家和殖民地,现实中不愉快的贸易与殖民关系,在观念中变成了不愉快的形象。19世纪西方的东方想象中,第一个东方远去了,第二个东方却迫近、现实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排斥、憎恨、轻蔑,也集中体现在第二个东方。印度与中国成为西方的东方想象中东方性的极端代表。在东方,它们是生产毒品与消费毒品的国家,对西方,它们是提供生棉、茶、劳动力市场与消费市场的殖民地,或可能成为殖民地的罪恶与衰败之地,是战争与冲突实际发生的地方。印度的雇佣军起义,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与义和团起义,都在罪恶的背景上加上了残酷与危险的色彩。当然,中国与印度尚有许多不同,除了各自表现出的东方性的特征与侧面不同外,还有,印度是正在接受所谓西方拯救的地方,中国却在以各种方式不断拒绝西方。第二个东方成为东方的黑暗中心,第三个东方处于东方的边缘,普遍的黑暗周边尚可泛起一线光明。第三个东方表现出地理文化上模糊的东方性。它可能在地理上不属于东方,如南太平洋岛屿,可能在文化上颠覆西方19世纪构筑的东方想象,如塔希提岛的乐园传说。当然,西方人很快就发现塔西提人身上的东方性格:热情浪漫的塔西提人几乎个个都是贼,他们信仰的神也荒诞不经。^①

东方的文化—地理概念不断变异、延伸,最终甚至等于了非西方的概念。在文化—地理秩序中,非洲,除了埃及之外不属于东方,但在西方的异域想象中,非洲却与东方具有相似性。19世纪西方将埃及人、印度人都称为“黑鬼”(niggers),似乎与非洲黑人没有什么区别。而非洲人又分为在美洲的黑奴、北非的摩尔人、埃及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美洲的黑人出现在美洲地理文化背景上,他们与印第安人分别代表着美洲白人创造的劣等民族与消灭的劣等民族。埃及在地理上属于非洲,但在文化上则属于东方。只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才是西方文化—地理想象中的非洲。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在西方传统的想象中,是一个可怕的黑暗大陆,炎热的气候、原始丛林、荒漠、致命的疾病、食人生番……19世纪中叶以前,除了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建立的几个奴隶、黄金与象牙贸易点和荷兰人在好望角建立的殖民点外,非洲大陆基本上是未知的。随着19世纪后期法、英等国对非洲的殖民入侵,荒蛮黑暗的非洲展现在欧洲人面前。西方人在狭隘的西方之后,看到了两种野蛮,一种是东方的,主要是亚洲的野蛮,这种野蛮是由文明的停滞与病态造成的,另一种是非洲的野蛮,那是文明等于自然的原始的野蛮。西方有人怀疑黑人是否有灵魂,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黑人至少没有头脑,没有健全的、成熟的头脑。19世纪西方人认为黑人几乎就是没有理智的动物,或者说智力至多发展到儿童的水平,他们懒惰,头脑混乱、漫无目的地自相残杀。即便贩奴是残酷而不人道的,至少对待黑人也不能像对待白人那样人道,因为黑人天生就是奴隶,他们身体健壮、头脑单纯,没有强制性的管教就不能自己,更何况黑人做奴隶的状况比他们在非洲莽林里做自由人幸福得多。19世纪的西方人,看世界有太多的轻蔑,看自己有太多的自信,正如一个英国人说的,也许英国

^① 库克船长1769年到塔西提, *Captain Cook's Voyages of Discovery* 中有关塔西提的描述,少有浪漫。关于浪漫的塔西提,全是法国人制造出来的。

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更重要的是,亚洲与非洲都需要英国。^①

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征服印度,西方历时四个世纪的发现与扩张进入最后的凯旋阶段。伊斯兰世界全线崩溃,从埃及到北印度,几乎变成文明的废墟。印度成为一个公司经营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女皇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征服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屿与黑非洲几乎不费气力,打败庞大的中华帝国,也像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狩猎或学习。这是欧洲实现亚历山大梦想接近基督教普世帝国的时代。

六

西方文化中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不仅将西方与非西方对立起来,而且确立了西方的优越与统治地位。这是西方思考与讨论世界文明与历史的范式,你可以从符号学角度称其为神话,也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称其为话语,总之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你可以改变其思考的内容,但不可以改变思维模式本身。比如,在地理意义上,“东方”与“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化中,意味着不同的地方,古希腊时代东方可能指波斯,西方指希腊,19世纪东方指从土耳其、埃及到中国、日本的广大地区,西方则指欧洲与北美。东方与西方的地理位置不断推移,文化意义也不断变化,甚至可能颠倒。16世纪的西方认为东方富强,西方贫困混乱,19世纪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认为东方贫困混乱,西方富强。17—18世纪间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的、宽容的。19—20世纪间西方哲学家又认为中国文化是非理性的、专制的。西方文化中东方与西方的地理与文化内涵不断变化,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没有变化。20世纪后期即使有许多学者批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他们批判该观念的内容,却没有批判该观念的思维模式,因为批判也还是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下进行,不过是将某些已经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

纯粹的地理上的东方与西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更多意义上它是文化的,或文化结构地理的。马丁·刘易士与卡伦·魏根在《大陆的神话》一书中解构了东方与西方的地理与文化内涵。^②如果说地球是圆的,东方与西方的划分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随意的。在中国,日本是东方;在日本,美国是东方;在美国,欧洲是东方。东方与西方的地理划分除了在全球视野下显得可疑外,严格说来,其地理概念也是不清晰的。西方可能小于欧洲,也可能大于欧洲,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基本上等于古希腊本身,罗马帝国时代时,等于意大利本土与西班牙一部分,中世纪时,等于西罗马帝国或拉丁基督教地区。16—19世纪间,西方的地理空间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北美成为第二个西方,在欧洲范围内却相对缩小了,波兰、俄罗斯等东欧地区与西班牙、希腊,似乎都变成了东方。西方等于西北欧与北美,19世纪德国历史

①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London: Ebenezer Baylis and Son, Ltd. The Trinity Press, 1969, p. 212.

②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Wa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hapter 2: “The Spatial Constructs of Orient and Occident, East and West”, chapter 3: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Wagen: The Cultural Constructs of Orient and Occident, East and West”, pp. 47 ~ 103.

学家兰克认为,只有日耳曼与罗曼语的国家,才属于西方。而到20世纪冷战时期,东方与西方的界线划到柏林墙。西方在向西北退移,东方却不断向东南伸展。古希腊时期的东方只限于中东,古罗马时期东方的地平线推到北印度,到地理大发现以后,东方延伸到中国与日本甚至东南亚(Sinic World)。从西方的东方观念的演变来看,至少有三个东方:一是西欧之东方,指东欧甚至西班牙;二是欧亚大陆之东方,指亚洲;三是世界之东方,它包括整个亚洲、北非甚至所有非欧洲与北美的地方。

如果说东方与西方的地理内涵模糊不清或游移不定,但其文化内涵却经常显得确凿雄辩,实际上人们经常以文化特征来确定地理区域。一种文明或一个民族、国家,可以根据其文化特征,将其归入东方或西方。埃及属于非洲,却由于其历史、制度、信仰甚至种族(闪族),毫无疑问地被归入东方,日本地处极东,20世纪后期却由于其现代化的成功,被归入西方世界。东方与西方的伪地理概念,实际上是文化构成的。古希腊划分东方与西方的尺度,是奴役与自由的政治经济概念;中世纪划分东西方的,是异教或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信仰概念;近代划分东西方的,是野蛮与文明的文化概念或种族概念(种族概念也是文化构成的);现代划分东方与西方的,又可能是意识形态概念。总之,在西方的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观念中,文化是地理的尺度。我们讨论的东方与西方,也是指文化意义上并以文化规划地理的东方与西方。

所谓东方与西方,首先是一种文化表述,这种表述确定了某种传奇式的、虚构的特征,这种莫须有的特征被人们想当然地当作某种“本质”(essence),使历史的产物具有了超历史的意义。古希腊人认为,波斯人是天生的奴隶,而希腊人生性爱好自由。19世纪西方人认为,东方的政治专制、道德堕落、经济贫困、思想愚昧,是由种族、环境、气候决定的,不改变这种自然环境,就无法改变人文环境,而这种环境、气候又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东方注定要在黑暗中沉沦、挣扎。西方使用西方与东方概念,往往意味着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如西方意味着理性、智慧、逻辑、创造力、勇敢、正直、成熟、健康、秩序、纪律、技术、科学、进步、繁荣,东方意味着非理性、迷信、情绪化、幼稚、软弱、病态、散漫、堕落、停滞、贫困、混乱……

西方与东方的文化特征正好相反,几乎所有与西方相关的,都是所谓优秀的文化品质,而所有与东方相关的,都是其否定面的特征。于是西方与东方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刘易士与魏根指出:“欧洲一直在与东方邻居的对比中解释其心理社会性质,这种思维习惯直到今天依旧盛行不衰。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对比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大众读物中,西方生活认同的一些相关的精神特征,总能在东方找到其反面特征,似乎东方就是为了与西方相反而存在的……据说欧洲文明的特征是征服自然,倾向于将自我当作与他人竞争的独立的个性;追求发展与进步的欲望永无止歇,酷爱个性自由;渴求物质财富;务实实干,努力通过各种技术改善社会生活,追求理性并遵循理性的原则。东方思维则完全相反,简而言之,东方的本质(the essence of the East)表现在公共意识、审美倾向与超验价值上,东方主张个人服从一个神秘永恒的整体……”^①

所谓西方的本质或东方的本质,都是某种文化构成物,其想象与虚构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真实。西方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内都比东方更迷信,东方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也比西

①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Wa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73.

方更先进。西方人认为,理性是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可直到18世纪,西方主张理性的启蒙哲学家,还推崇中国的理性与宽容精神,批判西方的神学与宗教政治迫害。西方将西方认同的文化的本质归结为理性,理性表现在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在思想上它主张怀疑、反思、逻辑、方法与观念的革命,将经验主义与推理主义结合起来,追求确定性、简单化、普遍性与逻辑全面性。在制度层面上,它主张法律保障下的政治自由民主与经济自由竞争。西方认同的这种所谓的理性文化,至多只是18世纪以后才出现并不断完善的,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本质,不如说是西方文化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西方认同肯定所谓的西方文化价值,排斥否定所谓的东方本质,即非理性的与专制的,这种观念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或者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今天熟悉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秩序,实际上是起于18世纪成于19世纪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文化偏见。

七

19世纪是西方文化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确定化、极端化的时代,东西方的差异完全变成了优劣等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是理性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大地,它在千百年来纹丝不动的非历史状态中沉沦,似乎所有的愚昧与苦难都是为了等待西方殖民者最后到来,西方殖民者想象自己是上帝一样的拯救者,“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西方带来了理性与文明,照亮了匍匐在黑暗大地上的无数可怜的扭曲的面孔和他们留在历史深处拖长了的身影。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偏见中,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傲慢。印度的婆罗门教不过在印度次大陆创造了一种种姓等级制度,英国的社会进化论则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一种种族等级制度。18世纪启蒙思想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尺度,文明与野蛮的尺度仍是历史的,因为它是由历史的进步与停滞造成的,出现在不同民族的历史不同的历史阶段,它随着历史出现也随着历史改变。19世纪的进化论思想,在文明与野蛮的历史尺度之外,又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提供了一个种族差异等级的自然的尺度,并以科学的方式表述出来。种族差异表现在历史之中却决定于历史之外。种族在历史中进化,但进化的主体种族又是由自然遗传决定的。人类进化的历史犹如一种竞赛,竞赛的过程假设公平,但结局又是预定的,劣等的种族注定要被淘汰,不管在进化过程中如何竞争,种族是不可改变的自然因素。

在西方19世纪的世界观念中,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秩序,又和白种与有色人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秩序重合起来。东方便是有色人种与野蛮的民族与国家,西方便是白种与文明的民族与国家。三种概念的重合,是西方不同时代世界观念秩序的重合,其中包括古典思想、启蒙哲学与进化论种族主义。这种重合类比本质上是随意性的,但表述得非常确凿,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神话。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功能便是将历史中虚构的东西自然化,构筑出某种所谓的“本质”,将某种权力秩序确定下来,使其显得不可置疑也不可动摇。文明与野蛮如果表现为历史的进步功能,是可以改变的。进步者可能因为某些历史原因而停滞,陷入相对的野蛮状态,但是,地理与人种却是无法改变的,它们属于自然因素。中国文明可能因为相对的停滞而陷入某种半野蛮状态,这在历史范畴内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将停滞与东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联系起来,将半野蛮状态与有色人种的所谓的低劣